

## 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人汉语教师

王 顺 洪

在外语教育中采用外国人教师，历来是世界上通行的作法。这是因为，本国人外语学得再好，也难以达到如同母语之程度。通过“外教”的教学，使学生一方面可以习熟原汁原味的外语，并且，还能从“外教”身上感触他国人的气质、习惯、文化等，从而营造并进入目的语之语境。同时，这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形式。

日本人学习汉语源远流长，据历史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6年，即公元285年，天皇专门从朝鲜半岛百济国请去王仁，教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汉文，也就是说，王仁是日本最早的外国人汉语教师。公元七、八世纪的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掀起崇尚唐文化的热潮，为直接诵读、欣赏汉诗汉文，“大学寮”专设了“音博士”职，先后从唐朝请去续守言、萨弘恪、袁晋卿等，教习标准的“汉音”。但是，后来由于“唐文化热”消退，汉文“训读法”流行，“直读法”衰弱，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等，从中国请“外教”的作法并没有延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与欧美争夺亚洲地盘，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处心积虑地向大陆扩张。1871年，明治政府主动与清朝政府签定“日清修好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后，中日间的文书、人员往来日益增多，为了培养汉语翻译，日本外务省于1871年专门设立“汉语学所”，从而拉开了其近代汉语教育的序幕。之后，其他一些官办和民间的汉语教学机构也相继诞生。主要有：东京外国语学校（1873）、日清社（1876）、兴亚会支那语学校（1880）、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善邻书院（1895）、东亚同文书院（1900）等。

明治时期以及整个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以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教育为中心，致力于培养学习者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为日本的对华外交、军事、商务、文化等需要服务。为了保证汉语教学质量，汉语教育机构积极聘请中国人作教师。

—

明治时期聘中国人作汉语教师，最早是从东京外国语学校开始的，第一位中国人汉语教师的名字叫周幼梅。

东京外国语学校成立于1873年8月（明治6年），前身是上述外务省所设的“汉语学所”。周幼梅，名愈，号幼梅，苏州人，旅日画家。东京外国语学校成立时，他寄居在东京筑地地区中国人杨某开的兑换店楼上。周幼梅是怎么被东京外国语学校聘任为汉语教师的，没有记载。据推测，是因为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的负责人颖川重宽，那时也住在筑地一带，与周幼梅在杨某的商店里有相遇的机会，认识了周幼梅，东京外国语学校成立时急需中国人教师，是他将周幼梅给招去了。颖川

重宽曾作过“日清修好条约”谈判的翻译，是汉语学以及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的开创者，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周幼梅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时间很短，不知何因，1874年1月就离开了，仅待了5个月。据史料记载，周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工作期间，每月的薪金是40日圆。

周幼梅离开东京外国语学校后，接任的中国人汉语教师叫叶松石，名炜，号松石，浙江嘉兴人，受聘时间从1874年初到1876年7、8月，约两年半。

叶松石被聘到东京外国语学校，是该校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物色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设立于1872年，比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还早一年，是日本第一个在华外交机构。

周幼梅、叶松石受聘于东京外国语学校时期，该校的汉语教学尚在沿袭明治前“唐话”教育的传统，教师均为原“唐通事”出身，所教汉语是南京话。周幼梅、叶松石，一个是苏州人，一个是嘉兴人，在该校都负责教汉语会话，自然也都教的是江浙话。

周幼梅、叶松石卸任之后均没有回国。1876年12月，一个叫广部精的日本志士在东京尾张町2丁目3番地开设了汉语塾“日清社”。广部精在开办日清社之前，从1875年2月就已开始跟着周幼梅学习汉语。叶松石也与广部精有关系，在“日清社”1877年2月27日初刊的《日清新志》杂志上，曾刊载了叶松石写的两首诗，表达了其客居异乡怀念故国的心情：

客中偶成 清人 叶松石

六桥游侣画中人， 故国湖山入梦频。  
几度欲归归未得， 勾留瑞为墨江春。

失 题

薰笼斜倚读南华， 屏护春寒曲曲遮。  
不信香魂同缃蝶， 忽飞清蒙上梅花。

广部精的日清社，从成立至1877年9月，不到一年就关闭了。其间在日清社教汉语及汉学的，除了广部精和另一日本人，还有一位叫王漆园的中国人教师。

王漆园，名治本，字漆园，亦是南方人，1875年到的日本。广部精与王漆园相识，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当时在东京筑地有一家中国杂货店，王漆园与店主王惕斋以堂兄关系生活在一起，广部精常去筑地找周幼梅学汉语，到王惕斋的店买东西，因而认识了王漆园。

日清社关闭以后，王漆园与广部精被请到一个叫“同人社”的汉语学习组织教汉语。1877年，王漆园被清朝政府驻日本东京公使馆录用，在公使馆人员与日本人士的诗文交谊活动中，他结识了日本名人河内辉声，成了河内辉声的诗文顾问。后来，王漆园在日本一直待到明治末。

上述的几位中国人汉语教师，都是在日本的汉语教育尚处于“南京语”时期受聘执教的，所以，他们均来自中国南方，教的是南方话。

## 二

1876年（明治9年）9月，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东京外国语学校开始，教授的汉语由原来的南京话改为北京官话。主要原因是，日本于1873年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在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北京官话。

东京外国语学校是官办的外语教育机构，首先承担着培养会北京官话外交人才的任务。但是，当时在日本很难找到教北京官话的教师，东京外国语学校在职的汉语教师，也都面临着从南京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

在该种形势下，东京外国语学校像当年委托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那样，通过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物色教北京官话的中国人教师。

通过驻北京公使馆聘请到的第一位北京官话教师叫薛乃良。据1876年9月30日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年报》在校职员外国人栏目和1878年6月的《文部省及所管辖学校雇外国人》栏目记载，薛乃良于9月1日到任，月薪100日圆。

薛乃良抵东京外国语学校执教时，日本没有北京官话教科书，只发现了一部由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编的《语言自述集》是北京官话，学生和教师们如获至宝，分头手抄下来由薛乃良教授。另外，薛乃良还自编了一本《眉前浅话》，也是手抄本，全书正文28页，共47课，每课都是10行左右每行约20字的简单日常会话。

薛乃良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教了两年北京官话，于1878年7月（8月？）卸任。接薛乃良第二个到该校的北京官话教师叫龚恩禄，1878年9月到任。日本文部省所编《明治13年6月雇佣外国教员录》对龚有如下记载：

姓名	龚恩禄
月薪	银币百五十圆
旅费	从清国来日和归国共银币百五十日圆
雇佣期间	明治11年9月6日至明治13年9月5日
居所	麦町中6番54番地

龚恩禄1880年任期结束归国之际，还获得了日方的奖励，据1880年《文部省第九年报附录》记载：

9月5日汉语学部雇清国人龚恩禄氏期满解雇，同氏服任中业务勤勉，赠白绢缩一匹、白缩二匹。

据有关资料记载，龚恩禄乃满洲旗人，当时的清朝，旗人若离开北京外出四十里会被处刑，

因此，他起了个汉族人的姓名。龚恩禄的祖父原为清朝高官，家道衰落后加入基督教成为牧师，龚恩禄与父亲英绍古（又叫绍古英继）都曾对在北京的日本人学习汉语、编纂汉语学习书，给予了很大帮助。

东京外国语学校从中国聘请的第三位北京官话教师叫蔡伯昂。据 1880 年《文部省及所辖学校雇外国人》及《东京外国语学校第九年报》记载：蔡伯昂于 1880 年 9 月 9 日雇入，契约两年，月薪 220 日圆。实际上，蔡一年零一个月就离职了，原因不详。1881 年《文部省第十年报附录》记载：明治 14 年 10 月 5 日，清国人蔡伯昂任中依愿解雇。蔡伯昂走后，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国人教师出现了空缺，七个月后才补上。

据 1882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第十年报》记载：5 月 4 日从清国聘来了关桂林，契约二年，月薪 220 日圆。在聘入关桂林的同时，东京外国语学校还雇进了另一名中国人教师，叫张滋昉，聘期从 5 月 16 日开始两年，月薪 80 日圆，一年后加到 100 日圆。

东京外国语学校所雇中国人教师历来是一人，为什么此时变成二人了呢？原因是：1880 年 2 月 16 日，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成立，核心人物曾根俊虎是海军大尉，为从事军事调查活动数次去中国，认识张滋昉，将张请到日本作了该校汉语教师。1882 年 5 月，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因财政问题关闭，张滋昉与 19 名学生一起转到东京外国语学校，所以，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人教师变成了两个人。不过，从月薪来看，曾根俊虎个人邀请的张滋昉与通过公使馆聘请的关桂林相比，相差不少。

1884 年 5 月，关桂林、张滋昉受聘期满，二人续签了合同：关桂林由 5 月 3 日续到 7 月 18 日，张滋昉由 5 月 15 日续到 10 月 15 日。据 1884 年《文部省第十二年报附录》记载，关桂林 7 月 19 日卸任时，日方给了他 100 日圆奖励。

张滋昉 1884 年 10 月 15 日续期满后，又被延聘了一年。1885 年 9 月，东京外国语学校并入东京商业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三部，次年 1 月改称语学部。张滋昉转入东京商业学校后，从 1885 年 10 月 16 日始，又续签了一年合同，一直干到次年 2 月语学部撤消。后来，张滋昉转到其他地方，其中从 1889 年 9 月至 1895 年 7 月，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及高等商业学校教汉语。

由上而知，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国人教师，除了张滋昉，均是通过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聘请的。而像张滋昉那样，由日本个人邀请的情况还有，比如：1879 年 8 月，以陆军参谋本部军官为中心成立的汉语学习会，曾通过当时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的龚恩禄聘请其弟龚恩长作老师；1879 年庆应义塾设立支那语科，聘请龚恩禄作兼职教师，龚 1880 年 9 月回国，庆应请了浙江省出身居住在日本的郭宗仪接任，等等。

### 三

明治中期，也就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日本的汉语教育曾出现短暂的走低，先前成立的汉语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关闭。到了明治后期，日本由于 1894 年对华战争和 1905 年对

俄战争的胜利，对华野心迅速膨胀，在新的背景下，汉语教育又呈现出了活跃的气象。1897年，曾于10年前被撤消的东京外国语学校重新建立（重建之初为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1895年咏归舍（后改称善邻书院）、1900年东亚同文书院等汉语学校的成立，是重要标志。

东京外国语学校重建后，继续聘请中国人作汉语教师。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有两人：金国璞和张廷彦。

金国璞，清代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现北京市大兴区）人，生卒年不详，京师同文馆出身。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同治元年）7月在洋务运动中设立的由总理衙门辖管的教育机构，起初只有英文馆，后来陆续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美国传教师丁韪良为总教习和校长。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同文馆撤消并入京师大学堂。

从1876年始，日本外务省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北京官话翻译，从东京外国语学校选派了少量学生，到驻北京公使馆以见习秘书身份学习北京官话，金国璞曾作那些人的教师。1897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恢复时，金国璞被聘到该校作汉语教师。

1898年进入外国语学校特别科，毕业后从事汉语书籍出版的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后来回忆当年上课情况时谈到：

金国璞的教法，比较注意四声，该先生说，汉语要像学唱歌那样。他不会日语，有时用一点英语。

张廷彦、金国璞都是同文馆出身。同文馆是新型的教育机构，两个人都会英语。

金国璞初次出国，东京地理不熟。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宫岛大八吩咐他的弟子、青年教师青柳笃恒，特别关照金国璞。青柳笃恒后来对当时情况有如下描述：

（金国璞）作为当时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即现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支那语教师，受文部省之聘来到东京，住在麦町山王下的临时寓所。当时受宫岛大八先生推荐，我拜辞了皇太后宫里的工作，到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作支那语讲师。我和母亲离开麻布的住处，搬到距住在麦町的金国璞先生住所只有几步的地方。我守在刚到日本的金国璞先生旁边，尽微薄之力，朝夕问候关照。尤其是，即将进入老境的先生从半藏门经过一桥到外国语学校的往返路上，我必定陪伴，以免发生任何问题，这是个重要任务。同时，因为几乎每天与一句日语也不会的金先生接触，对于支那语很差的我，正是学习锻炼的难得机会。我俩每天来往于山王下和一桥之间，成了我实际充分练习汉语的课堂。

宫岛大八和青柳笃恒本来是善邻书院的教师，所以，也请金国璞到善邻书院教汉语。另外，金还在高等师范学校兼课。

从1897年9月至1903年7月，金国璞在日本作了六年汉语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他编写了一系列汉语教科书：

1898年12月，金国璞与日本人平岩道知合编的《北京官话谈论新篇》出版，日本知名汉学者

服部宇之吉教授为该书写了序，其中谈到：

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清语教师金国璞，在本国多年教本邦留学生学习清语，就任职后，先生考虑到想学官话者没有合适的课本，与参谋本部的平岩道知合编了谈论新篇百章。

该书还有张廷彦撰的序文，其中写到：金公卓庵晓英文娴辞令博学多识授话一道尤为擅长……

1901年12月，金国璞的《北京官话士商丛谈便览》（上卷）由文求堂出版。该书共55章，包括出口商品、禁止偷售兵器、生丝市场的跌落、报社事情、商卖活动谈话等，各章均采用对话体。下卷于1902年6月出版。同年，金国璞编的时文教科书《支那交际往来公牍》由泰东同文局出版。

1903年，金国璞新编的《华言问答》和《官话指南》改订版，分别于4月、5月由文求堂出版。《官话指南》直到1945年，曾再版一百多次，1900年还在上海出了英语版、法语版。

1903年7月，金国璞结束在日本的汉语教师工作归国。该时，由在北京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山本泷太郎等发起，举行了金国璞归国欢迎会，随后，在东单二条胡同开设了“支那语研究会”（1905年12月更名为“清语同学会”），请金国璞当老师。而后，金国璞继续指导日本人学汉语，同时又编了一些新的教材，主要有：《北京官话今古奇观》（一、二编，1904、1911年分别由文求堂出版），《北京官话虎头蛇尾》（1907年由北京日本人清语同学会出版），《缙绅谈论新集》（与镰田弥助合编）、《华语分类撮要》（与濑上恕治合著）（均于1907年由文求堂出版）。

#### 四

明治后期几乎是同时与金国璞到日本作汉语教师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张廷彦。

张廷彦，字少培，号云鹤，1864年3月7日出生，与金国璞是同乡，也毕业于同文馆。张于1897年8月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聘到日本作汉语教师，同时也在善邻书院授课。1898年7月一度回国，1900年再次赴日，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教汉语，同时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及善邻书院等校授课。1906年9月，张廷彦到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1908年、1909年，先后辞去东京高商、东京外校的工作，在陆军大学作专任教师，同时依然在东京帝大和善邻书院授课。张廷彦还是后来日本著名汉语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的“恩师”。仓石五四郎于1918年9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他对东京帝大训读汉文的教学传统非常反感，独自一人跟着张廷彦直接用汉语音诵读汉文汉诗，时间长达数年，对其奠定汉语基础颇有帮助。

张廷彦在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同时，也编了许多汉语教材，多数由文求堂出版，主要如下：

1898年11月，出版了《北京风土编》。1899年6月，出版了《支那音速知》。1904年4月，出版了《支那语动字用法》，该书将755个动字按发音顺序排列，列出各动字的使用句例，加上日语翻译。那是一本学习参考书，直到1947年还在再版。

1904年8月，宫岛大八著名的《官话急救篇》出版时，卷末所附的《家庭常语》和《应酬须

知》乃张廷彦所写。同年10月，张廷彦出版了《日清语入门》。次年2月，出版了与田中庆太郎合著的《官话文法》。

1906年11月，出版了《动字分类大全》，其中分为形体部、人事部、物理部三部分，各部设了数个项目“门”，列出了各个“门”的动字，各个动字举出了使用句例。

1911年5月，出版了《北京官话》。1918年3月，出版了《三国选萃一支那最新通用官话》。

1919年6月《普通官话新华言集》，1920年10月《华语初级》，1921年4月《华语启蒙》，1921年12月《最新官话谈论篇》（与李俊漳合著），陆续出版。

1924年3月，《华语捷径》出版。同年12月，《中日合璧通商会话》（与吴泰寿合著）出版。

1936年4月至1938年2月，与东京外国语学校包象寅、陆军大学的宫岛吉敏及平冈龙城合编的《日华大辞典》共三卷三册，由东洋未刊图书刊行会陆续出版。该辞典是大型辞典，收集资料等工作10年前就开始了。

然而，张廷彦本人并未看到《日华大辞典》的出版，1929年2月，编纂工作进行途中，他就去世了，终年56岁。

张廷彦去世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该校的刊物《斯文》第11编第3号（昭和4年3月1日刊）对张的逝世及其生平作了如下报道：

#### 张廷彦氏长逝

作为本邦支那语学界宿老而众所周知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张廷彦氏，患呼吸道感染病入院治疗中并发肺炎，2月12日下午2时55分溘然逝世。氏本邦知己门弟甚多，接讣告后，以帝大支那哲文学科教授学生为主，陆军大学、外语学校及其它各方支那学界，唁电唁客纷纷到来，15日下午2时始，于本乡蓬莱町长元寺，由张生前信仰之日莲宗为其行事致哀，知友门生多数相集，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葬仪。

张氏，字少培，号云鹤，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人，同治3年3月7日生。明治30年受聘来日作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31年一度归国，33年再次来日在帝大授支那语，41年从东京高商辞职，因功授勋五等，获瑞宝章，兼陆军大学校教官，大正9年辞之。曾在东京外国语学校、陆军经理学校、铁道省奉职，在东大执教约30年，直到今日。其教门弟，搞翻译，于本邦支那语学界功绩实谓伟大。晚年未归故里，嗣子亦大分高商奉职，东京知友甚多，遂显其志。

从报道可以看出，张廷彦作为一名中国人汉语教师，在日本执教三十余年，于日本汉语学界还是颇有影响的。

以上仅是根据有限资料对明治时期部分中国人汉语教师的介绍。迄今为止，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发掘、介绍、论述比较多的，是中日文化人之间的交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日本派教习来中国，日本书籍的汉语翻译，等等。而中国人被日本聘请作汉语教师，尚所知无几。其

中一是因为历史资料稀少，难以查寻，不为人们所关心和重视，二是因为语言仅是工具，在当时背景下为日本人教习汉语，怎样评价其作用不易把握。不过，“日本中国人汉语教师”毕竟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中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种必然出现的客观想象。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师”的足迹已遍及东瀛乃至全世界的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和开展该方面的研究。

记：日本著名汉语学者、原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先生，是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创立和奠基者，大半生从事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研究，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整理、著述出版了大量资料集、文章、著作，做出了十分杰出的宝贵贡献。其中，《中国語教育史研究》《中国語教学書誌》《漢語師家伝》《中国語教育關係書目録》四本著作已被翻译到了中国（中国书名为《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附〈日本汉语教科书·工具书目录〉》，译者王顺洪）。中国杂志《汉语学习》1999年第4期曾刊载过笔者所写的《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教育史研究》一文，对六角恒广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2003年12月30日，六角恒广先生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4岁。本文主要根据六角恒广先生《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遺》（2002年出版）等著述所提供的日文资料写成，在六角恒广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作者：北京大學派遣帝塚山学院大学客員教授）